

漆耳杯盒源流考

刘芳芳¹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江苏 苏州 215005）

【摘要】漆耳杯盒为存储耳杯的一类漆器，出现于战国早期，发展于战国晚期至秦，成熟于汉，汉以后日渐式微。战国、秦至汉代初期的耳杯盒主要出土于两湖地区，均为上下对合式，器形从狭长形逐渐演变为椭圆近圆形。西汉中期以后，江淮地区亦出现了耳杯盒，但为套式耳杯盒，呈现出与两湖地区迥异的风格，体现了汉文化背景下漆艺的地域差异。

【关键词】耳杯盒 漆器 两湖地区 江淮地区 双耳长盒 套式耳杯盒

【中图分类号】 K871.41 **【文献标识码】** A

漆耳杯盒为与耳杯配套，却较晚出现、较早消失的一类专门存储耳杯的漆器。耳杯出现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秦汉。耳杯盒出现于战国早期，发展于战国晚期至秦，成熟于汉，汉以后日渐式微。汉代，耳杯又名“具杯”¹。湖南马王堆M1简一九五记有“漆画小具杯廿枚”²。江西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多件底部书有“李具”二字的漆耳杯³。汉代简牍称耳杯盒为“具杯枱”“具器”。有的耳杯盒附囊。《汉书·何武传》：“（何）寿为具召武弟显及故人杨覆众等……”颜注：“具谓酒食之具也。”⁴考古报告或简报中称耳杯盒为“酒具箱”“酒具盒”“具器”等。据目前考古资料，耳杯盒主要出土于两湖地区与江淮地区，其他地区出土极少。本文利用考古资料梳理战国秦汉时期耳杯盒的滥觞期、发展期及成熟期，重点探讨汉代耳杯盒在前代基础上的演变、江淮地区出土的套式耳杯盒，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耳杯盒之滥觞期

战国楚墓出土耳杯盒皆以厚木胎斫制、挖制、雕镂而成，器盖与器形大小相同，有些附环等金属构件。盒内存储物品较多，除了耳杯之外，还有其他饮食器具。战国早期，楚墓出土耳杯盒一般形体较大，长达1米左右。战国中期以后，耳杯盒的形体出现了明显变小的趋势，长度一般在40~70厘米之间。制作更为精美，器表两端常雕镂精美的动物形象，动物吻部凸出，形成凹槽，便于捆绑携带。这一历史阶段的耳杯盒主要出土于湖北随县、荆门、江陵等地。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一件狭长方形酒具箱（C.10），平底，上作子口，承盖。盖微隆起，为一块整木剜成。器内髹朱漆，外髹黑漆，没有施彩。内分6格，分置方盒4件、圆罐形盒1件、耳杯16件以及鸡骨、鲫鱼骨等。中有隔板，隔板上还有木勺、竹荚各2件。长125.4、宽19.6、高18.8厘米⁵。这是一件器形较大的贵族酒具箱，两端无捉手。

楚国精美的耳杯盒以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彩绘猪形酒具盒为代表，出土时内盛3件耳杯。酒具盒（M2：103），厚木胎，挖制辅以雕刻。由盖与器身扣合而成，盖与器身内腹壁皆挖制，外形雕刻。整器为双猪首对称连体，呈长椭圆筒状，器身与器盖对称各一半。器形两端对称，两端雕成猪头状，嘴鼻外凸，两端各有一小型销栓固定器盖，以免滑动（图一）。顶部部角根内侧装有作提手用的铜环。深弧腹壁，圆形底。器身下雕倨伏四足。全器内外光洁，内髹红漆，外髹黑漆为地，用红、黄、灰、

¹作者简介：刘芳芳（1979—），女，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战国秦汉考古、古代漆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淮地区出土汉代漆器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6BKG016）阶段性成果之一

棕红等色彩绘花纹，器上绘了八幅小画面的宴乐、狩猎图。盖壁胎厚 1.9、底胎厚 1.1、通长 64.2、宽 24、高 28.6 厘米⁶。该器造型为文献记载的“并封”“螯封”“屏蓬”之类的神物形象。《山海经·海外西经》：“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鼈，前后皆有首，黑。”⁷并封形耳杯盒在湖北江陵雨台山 56 号墓中亦有出土，长 43、宽 15、高 20 厘米⁸。



图一//并封形耳杯盒

（荆州天星观 M2：10；图片来源：《楚风汉韵：荆州出土楚汉文物集萃》，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第 81 页）



图二//龙首耳杯盒（湖北包山 M2：4；图片来源：《中国漆器全集》第 2 卷，第 28 页，图二五）



图三//彩绘双耳长盒（云梦睡虎地 M9：51；图片来源：《中国漆器全集》第 2 卷，第 116 页，图一〇二）

湖北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耳杯盒（M2：4），盒两端为浮雕龙首，器身外侧下部两端浮雕由云纹组成的龙足。内竖置圆耳杯两套共 8 件、壶 2 件和方形盘 1 件。通长 71.5、宽 25.6、高 19.6 厘米（图二）。耳杯盒外套有皮囊，口部以皮革带扎死⁹。这类耳杯盒在江陵望山楚墓一号墓中亦有出土。

楚耳杯盒是贵族宴乐或狩猎时盛放耳杯、壶、盘等酒具的便携式饮食器具盒。早期器形较大，为狭长方形盒状，晚期器形变短，盒的长径为短径的两倍以上，外形为长椭圆形。

二、耳杯盒之发展期

目前学界认为，战国晚期到秦代，漆耳杯盒可能存在两种形制：一种为双耳长盒，一种为椭圆形耳杯盒。

双耳长盒出现于战国晚期到秦，为秦所特有的一种器形，存在时间较短。由盖与身上下扣合而成。圆角长方形，两头有双耳为把，盖上与器底的两短边均有弧形假足。双耳长盒形制与战国楚墓出土的并封形耳杯盒颇为相似，两头保留了猪首的轮廓，器足由蹄足变成弧形假足。因双耳长盒颇似并封形耳杯盒，有学者认为双耳长盒为一种耳杯盒¹⁰。器表不再有并封形耳杯盒的复杂雕刻，器身较短，长 25 厘米左右，宽约 13 厘米，高 10 厘米左右，长约为宽的 2 倍。双耳长盒有彩绘，亦有素髹无纹。彩绘纹样较为简洁，以变形云鸟纹最为常见。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一件彩绘双耳长盒（M9：51），木胎挖制而成。由底、盖扣合而成。平面呈椭圆形，两侧描绘成猪的头部，猪的吻部向前突出，构成了可供持捧的盒耳，盖上及外底均有弧形矮足。内红外黑，器表以红、褐色漆绘圆圈纹、变体鸟纹等图案。长 27.8、宽 13.3、高 11.8 厘米（图三）。盖顶与外底两端有“咸亨□”“□亨□”和“亨”等烙印文字¹¹，产自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

双耳长盒与椭圆形耳杯盒曾短暂共存于秦代，入汉以后，仅见椭圆形耳杯盒，鲜见双耳长盒。睡虎地 M13 同时出土一件双耳长盒和一件椭圆形耳杯盒。双耳长盒（M13：14），长 26.5、宽 13.5、高 10.5 厘米，器表绘云鸟纹、鸟头纹和圆圈纹。椭圆形耳杯盒（M13：2），由盖与身扣合而成。盖与身形制相同，外为椭圆形，内作耳杯形，底部与盖顶部的剖面略呈弧形，腹外有两道凹弦纹。内红外黑，素髹无纹。盒内平叠 5 件大小相同的耳杯。长 15.5、宽 13.5、高 11.3 厘米¹²（图四）。此椭圆近圆形耳杯盒，长略大于宽，内存器具仅为套耳杯，为秦统一之后出现的新型耳杯盒，汉初耳杯盒延续了此形制。睡虎地 M13 出土的双耳长盒内无耳杯，而椭圆形耳杯盒内存耳杯，似乎说明双耳长盒并不一定为耳杯盒。1975—1976 年，云梦睡虎地出土 10 件双耳长盒，其内皆不见耳杯等饮食器具。云梦 M44 出土 1 件双耳长盒（M44：23）¹³，对照随葬器物分布图，敞开的双耳长盒的附近分布着数件耳杯。然而，出土双耳长盒至今未见存放耳杯的实例，双耳长盒是否为收纳耳杯的器具尚存疑，故而，在考古简报中有把部分双耳长盒误称为“双耳长杯”。四川荥经古城坪 M1 出土的所谓“双耳长杯”（M1：15），圆角长方形，两端有双耳作把，器底两短边有弧形假足。内外均髹黑漆。长 25、宽 12.5、高 4.2 厘米¹⁴。此“双耳长杯”应为一件双耳长盒的一半。



三、耳杯盒之成熟期

西汉为耳杯盒的成熟期，耳杯盒内部空间利用率高，功能设计更加合理。一方面，盒内容纳的耳杯数量较多，达数十枚，西汉中期以后，耳杯盒内耳杯的尺寸又有大中小之分；另一方面，耳杯盒内还存放多件与耳杯配套使用的漆盘。

西汉中期以前，耳杯盒皆为椭圆形，主要出土于两湖地区。耳杯盒皆为厚木胎斫制、挖制而成。长径在20厘米左右，短径比长径略小。盖与身以子母口上下扣合。盒内耳杯平叠或侧叠对合放置。秦代至汉初，椭圆形耳杯盒多素面无纹，文景时期多有细密的彩绘纹样。

西汉中晚期以后，椭圆形耳杯盒已较为少见。江淮地区出现一种新型的似奩的耳杯盒，盖套合于身的外部，笔者称这类耳杯盒为“奩式耳杯盒”，具体可分为“内嵌式双层分格耳杯盒”与“多子奩式耳杯盒”。奩式耳杯盒的胎骨为薄木胎或夹纆胎，不见厚木胎。内设槽孔以装杯、盘，或内置花瓣形（即耳杯形）子盒。盒内耳杯的置放方式不见侧叠，仅有平叠或倒叠。

考古出土汉初耳杯盒数量不多。出土耳杯有多件叠放并捆绑的情况¹⁵。西汉早期，椭圆形耳杯盒主要出土于两湖地区文景时期的墓葬之中，墓主身份一般较高。文景时期的漆耳杯盒器形大致相同，内存6~10件耳杯。耳杯置放方式以侧叠为主，少量平叠。侧叠的耳杯中，其中有一件反扣，反扣杯为重沿，三角形剖面耳，置于耳杯盒中，不论放置在中间还是一侧，都能与其他顺叠耳杯紧密扣合，扣合后，耳杯内底处于封闭状态，有利于保持杯体的卫生。这种设计充分体现了汉代匠人的巧思。

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耳杯盒（头箱32号），由形制基本相同的器盖与身扣合而成。外作椭圆形，内为耳杯形，腹外有两道凹弦纹。木胎，内红外黑。长16.5、宽15.8、高11.8厘米。据耳杯的形制与盒里的情况复原，盒里应平放6个耳杯。耳杯盒的盖与外底均有烙印的“亨”字。这件耳杯盒对应着木牍所记“具器一具”¹⁶。马王堆M1出土云纹漆耳杯盒（标本东177），斫木胎，盒内装7件小耳杯，6件侧放顺叠，1件反扣。长19.2、宽16.2、高9.3厘米。简一九六“𠙴画具杯拾二合”即指此器，出土数量比简文少一件¹⁷。马王堆M3出土两件彩绘耳杯盒（北122、西26），斫木胎。器形大小相近，形制相同。椭圆形，由盖与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盖与身形制相同，宽沿，弧腹，平底，底有椭圆形圈足，内空为方形，两端稍突出为捉手。出土时盒内置9个小漆耳杯，8个顺叠，最后一个反扣。反扣为重沿，两耳断面三角形，恰与8个顺叠小耳杯严密相扣，简二四九称为“𠙴画具杯口”。两件耳杯盒皆长19、宽16、高12厘米。M3两件耳杯盒与M1耳杯盒形状、结构、纹饰基本相同，应该为同一人制作¹⁸。

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一件耳杯盒（168：79），木胎斫制。椭圆形，直口，外壁呈弧形，内壁向内折，圆底，矮圈足，两长边有凸出的短把。盖顶隆起，四周有凸棱。盖与身以子母口扣合。内红外黑，整器除底部外，满饰以朱、灰黑无光漆彩绘云鸟纹、变形鸟头纹、点纹和圆卷纹。纹饰主次分明，线条勾勒交错，十分绚丽。长20.5、宽16.8、高13厘米。简三五记“具器一合，杯十枚，有囊”。出土时包囊已朽。盒内盛放耳杯10件，其中1件为重环耳，余9件为半月形耳¹⁹。存放10件耳杯的耳杯盒在长沙望城坡渔阳墓²⁰、荆州高台M33皆有出土。高台汉墓出土彩绘耳杯盒（M33：31），内存耳杯10件，每边5件，耳杯底部朝外，中间2件则杯口相对。盒内耳杯除了中间1件为放置方便而将杯耳削去外，余皆为圆耳（图五）。长20.3、宽16.8、通高12.6厘米²¹。新出现的重沿、三角剖面耳杯适应了耳杯侧叠于盒内的需要，使耳杯套装更为稳定，存放耳杯数量也更多。设计精巧奇特。



图五//椭圆形彩绘耳杯盒（荆州高台 M33：31；图片来源：《荆州高台秦汉墓》，彩版七：2）

据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奩式耳杯盒大约出现于西汉中期，设计合理，功能性强，主要出土于江淮地区，数量较少。江淮地区出土的奩式耳杯盒与两湖地区出土的椭圆形耳杯盒外形风格迥异：前者外形如同一个大型奩，器盖套合于器身之外近底处；后者两侧附耳，外形为椭圆近圆形，上下对合而成。依形制差异，可将江淮地区出土的奩式耳杯盒分为两型。

A 型内嵌式双层分格耳杯盒。圆筒形，器盖套合至器身外部近底处。双层，内嵌一小盒，盒内分成多个小格，小格内存放耳杯，盘倒扣于耳杯之上。

1981 年，江苏扬州宝应县原天平乡前走马墩汉墓出土一件内嵌式双层分格耳杯盒，木胎，筒状，由盒盖和盒身套合。穹窿顶盖。内红外褐，素面无纹。盒身内嵌叠放耳杯的槽孔三个，平叠大、中、小耳杯各 10 件，上部覆叠漆盘 5 件。耳杯、盘均木胎，髹褐漆，内底均朱绘朱雀一只。盘高 5、口径 24.5、底径 9.5 厘米。大杯长径 14.5、中杯长径 12.8、小杯长径 10.1 厘米。盒径 27、高 22 厘米²²（图六）。这件耳杯盒纳杯、盘于一体，空间利用率极高，实用性强，精巧便携。

B 型多子奩式耳杯盒。器形为正方形或圆形。器盖套合于器身近底部，内设数枚子盒，一般为 3 枚。子盒如同多子奩的子奩，有大、中、小之分。子盒腹较深，有的为椭圆形，有的为耳杯形。内设的子盒均无盖，耳杯依照尺寸的不同，依次平叠或倒叠于相应的子盒内。根据多子奩式耳杯盒的外形差异，又可分为两亚型。

Ba 型耳杯盒身为正方形。盞顶式盖，盖套合于器身外壁近底处。

最迟在西汉中期，江淮地区出现了多子奩式方耳杯盒。江苏盱眙东阳汉墓 M208 出土两件漆耳杯盒。耳杯盒（M208：139），保存完好。夹纻胎，器盖盞顶，平面呈正方形奩盒状。通体髹黑漆，素面。器边长 26、身高 17.4、盖边长 27.2、盖高 19.6 厘米。器内含 3 件尺寸依次递减的子盒及漆盘（图七：1）。子盒皆为椭圆形，内各倒扣一叠耳杯，共计 29 件耳杯，8 件漆盘则倒扣于子盒之上²³。3 件子盒两竖一横分布于器底（图七：2）。

Bb 型耳杯盒身为圆形。穹窿顶盖，器盖套合于器身外壁近底处。

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 M1 出土耳杯盒（M1：176），原发掘简报中称为“果盒”²⁴，发掘报告又称为“漆奩”。胎骨由木胎与夹纻胎组合而成，内髹朱漆，外髹黑漆，由盖、身及盒套合而成。圆筒形，盖顶隆起，肩部出棱，外壁圆直。盒身平底，内隔成大、中、小三个耳杯形盒，均直壁平底。大号耳杯形盒平放在盒底，现已不能分开，无法判断原来是否粘结，中号比大号浅 0.3 厘

米，小号比大号浅 1.6 厘米，三盒口沿间用木胎面板相连。装饰纹样以云气纹、禽兽纹为主，几何纹为辅，采用锥画辅以彩绘手法，纹样装饰于奩盖壁、奩身外壁和盖顶、套盒面板。该器通高 14、壁厚 0.3~0.5 厘米，盖高 14、直径 25.8、身高 8.5、直径 25 厘米²⁵（图八：1）。出土时内置耳杯形子盒三件，尺寸依次递减，装饰技法相似，皆为锥画辅以点彩。大盒（M1：178），长 15.6、宽 11.8、高 5.5、壁厚 0.2 厘米（图八：2）。中盒（M1：177），长 13.3、宽 10、高 5.4、壁厚 0.15 厘米。小盒（M1：179），长 12、宽 9.1、高 5.5、壁厚 0.15 厘米²⁶。

西汉中晚期以后，江淮地区盛放耳杯的子盒出现了花瓣式造型，短径为椭圆弧形，长径对称处如杯耳的弧形，这种造型的子盒既美观，亦方便存取耳杯。与三角圩 M1 出土的耳杯盒类似的有安徽天长安乐乡西汉晚期墓出土一件“丙”字黑漆耳杯盒和一件“丁”字耳杯盒，皆无盖，夹纻胎，口呈四出弧曲椭圆形，外侧口沿下分别书写“丙”“丁”字。“丙”字耳杯盒长径为 14 厘米，“丁”字耳杯盒长径为 12 厘米²⁷，用于存放不同大小的耳杯。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多子奩式耳杯盒可能来自于广陵王刘胥广陵国的官营作坊²⁸，至少其制作工艺受到了广陵漆艺的影响。《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木器》一文中对漆奩（M1：341）如此描述：“一套（4 件）。一大三小，4 个器盖均缺失。夹纻胎，表髹黑漆，里髹朱漆，器里口沿处髹一圈黑漆。直口，圆唇，直壁，平底。4 件漆奩均通体素面无纹饰。母奩直径 24.5、高 10 厘米，4 件共重 705 克”²⁹（图九）。漆器（M1：341）实为一套多子奩式耳杯盒，内部三个花瓣式小盒用于存放相应大小的耳杯，小盒本无盖，仅大盒缺盖。相关图录编者称之为“成套漆耳杯”³⁰，认为此为一套存放耳杯的器物。



图六//内嵌式双层分格耳杯盒（扬州宝应走马墩汉墓出土）。

图片 1 来源：《宝应馆藏文物精萃》，第 60 页，图 1；图片 2 来源：《中国漆器全集》第 3 卷，第 112 页，图一八四）



图七//多子衽式方耳杯盒

1. 多子衽式方耳杯盒 2. 多子衽式方耳杯盒内子盒分布图（盱眙东阳汉墓 M208：139；图片为南京博物院陈刚研究员惠赠）



图八//多子衽式圆耳杯盒及内存大盒

1. 圆耳杯盒 (M1:176) 2. 内置耳杯形子盒 (M1:178) (天长三角圩 M1 出土。图片 1 来源:《天长三角圩墓地》, 第 68 页, 图五九; 图片 2 来源: 同书彩版七五:1)



图八//多子奁式圆耳杯盒及内存大盒

1. 圆耳杯盒 (M1:176) 2. 内置耳杯形子盒 (M1:178) (天长三角圩 M1 出土。

图片 1 来源:《天长三角圩墓地》, 第 68 页, 图五九; 图片 2 来源: 同书彩版七五:1)

安徽天长安乐公社北冈大队汉墓出土三件椭圆盒, 笔者认为这三件椭圆形盒当为一件多子奁式圆耳杯盒内的三枚子盒。三件椭圆盒皆黑漆无纹, 每件内置八只耳杯, 耳杯底部均书有“陈挥卿第一”。三件椭圆盒的底部也书有“陈挥卿第一”, 置于一大圆盒内, 亦黑漆无纹, 朱书“陈挥卿第一”, “第一”为标号³¹。从器形结构、装饰技法以及漆器铭文来看, 这三件椭圆形子盒、内存耳杯以及大圆盒当为一套多子奁式圆耳杯盒。

江淮汉墓发掘简报中被称为“黑色杯套”的器物, 可能与耳杯盒有关。江苏盱眙东阳小云山 M1 为西汉中期以前的墓葬, 墓中出土耳杯 64 件, 有夹纆胎和木胎两种。夹纆胎保存较好, 木胎已腐烂, 内红外褐, 其中 16 只耳杯有“黑色杯套”³²。简报没有相关具体描述, 亦无图片, 故不能确定“黑色杯套”是否为黑漆耳杯盒。汉代东阳地区有漆器作坊³³, 小云山 M1 出土“东阳庐里巨田侯外家”铭文漆盘与“黑色杯套”很可能皆产自本地。

多子奁式耳杯盒内的子盒也可独立成器, 如同多子奁内的诸多子奁可作为独立器形使用一样。扬州邗江西湖蜀岗村汉墓出土一件花瓣式漆耳杯盒, 夹纆胎, 四出花瓣式, 外髹黑漆, 内髹红漆。此盒出土时无盖, 内部正面顺叠 4 只耳杯, 耳杯髹漆、纹饰皆与耳杯盒一致。盒身上下边口由锥画短线组成几何纹、刻划双线一圈收边³⁴。盒身主体锥画云气纹, 线条流畅, 造型别致 (图一〇)。蜀岗村汉墓出土的耳杯盒和前文所述安徽天长三角圩 M1 出土的耳杯盒相比, 仅装饰技法略有不同。江苏淮安青莲岗东汉墓出土一件海棠形黑漆盒, 夹纆胎, 四瓣海棠花形, 分为盖、身两部分。盖壁较深, 无子母口, 通体黑漆无纹。长 15、宽 11.2、高 5 厘米³⁵ (图一一)。这件海棠形黑漆盒与蜀岗汉墓出土的漆耳杯盒造型相同, 就其功用来看, 可能为东汉时期的一类耳杯盒或受耳杯子盒启发而制作的新型漆盒。

古代器物在设计技术方面常互相借鉴, 有异器同构的现象。江淮地区的奁式耳杯盒在西汉中晚期开始出现, 其设计灵感应来自于汉代流行的多子奁。在经济文化大流通的背景下, 必然伴随着技术上的互相促进和艺术上的互相借鉴, 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漆器的需求和喜爱³⁶。

西汉早期已存在将小酒杯收纳于奁内的情况, 但无西汉中晚期的杯形槽孔或杯形盒的专门设计³⁷。奁为极具汉代特色的一类器形, 研究者常根据奁内存放的物品, 称存放梳妆用品的奁为“妆奁”, 称存放食器的奁为“食奁”。

长沙马王堆 M3 出土食奩（南 37），卷木胎，盖圆拱。身直壁，平底，内外髹黑漆。彩绘云纹、几何纹和猫纹。外底朱漆书“二斗”，底内外圈黑漆书“君幸食”。奩内装 7 个小酒杯。直径 26、高 12 厘米³⁸。江苏连云港海州南门大队侍其繇墓出土一件制作精美的食奩（侍 15），圆筒形，有盖。内壁施红漆，底部及盖顶的中心均有黑色“中氏”印记，器表彩绘人物舞蹈图。器内盛放大、中、小三组耳杯，计 7 件³⁹。另有一件耳杯出自 12 号陶瓮内，应和这 7 件合为一套。三组耳杯长径分别为 15.6、14.4、10.7 厘米。这件食奩为存放三种型号耳杯的耳杯盒，由于器壁朽甚，器形结构难以确认。



图九//多子奩式耳杯盒（江西南昌海昏侯墓 M1：341；

图片来源：《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木器》，《文物》2018 年第 11 期，第 39 页，图二二）



图一〇//花瓣式漆耳杯盒

（扬州邗江西湖蜀岗村汉墓出土；图片来源：《中国漆器全集》第 3 卷，第 121 页，图一九八）



图一一//海棠形黑漆盒

（淮安青莲岗东汉墓出土；图片来源：《中国漆器全集》第3卷，第173页，图二九六）

古代器具皆有其主要功用，如樽为盛酒器，筥为收纳容器，耳杯盒则为存储耳杯的专用器具。器物功能上的相互借用现象也较为常见，如耳杯可为饮器，亦可为食器，筥、盒、樽也可收纳耳杯。扬州高南汉墓出土的一件漆筥内倒扣着数十件对鸟纹耳杯。盐城三羊墩汉墓出土木胎漆盒，均为长方形套盒，内外均髹黑漆，大小不一。分别置放衣物、鱼骨、鸡骨，其中一件内存4件漆耳杯，朽甚⁴⁰。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出土漆樽（M1VI：3902）内置89件小耳杯⁴¹。

奩式耳杯盒实用、卫生、便携，内部容量远超于汉初两湖地区常见的椭圆形耳杯盒，具有很强的功能合理性。扬州宝应走马墩耳杯盒内存35件杯、盘，盱眙东阳M208耳杯盒则存37件杯、盘。目前，奩式耳杯盒出土数量较少，且集中于江淮地区，应为当地所制新型耳杯盒。制作技术上，除仰赖于西汉中期薄木胎技术、夹纻胎技术的高度成熟外，奩式耳杯盒也借鉴了其他器物的造型结构。内嵌式双层分格耳杯盒与汉初广陵地区出现的内嵌式双层分格奩⁴²在设计风格上极其相似，很明显，这种耳杯盒在设计上受到了内嵌式双层分格奩的启发。多子奩式耳杯盒的设计理念与汉代流行的多子奩更是同源，这点无需多言。

前文所述的江淮地区出土的耳杯盒皆为实用器，在江淮汉墓中也有明器类耳杯盒。安徽巢湖放王岗一号墓出土耳杯盒（FM1：385），残破，斫木胎。圆角，长椭圆形。由器盖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两端凸出一圆饼状捉手。内施红漆，无纹饰。器表髹黑漆，用朱漆绘几何纹、变形鸟纹和云纹。长51.6、宽15.6、高12.8厘米⁴³（图一二）。此耳杯盒造型具有鲜明的战国中晚期楚文化特色，纹样却颇具汉风。盒内未发现耳杯之类的器物，却雕琢出了耳杯侧放的形状，当为墓主吕柯的随葬明器。

四、结语

耳杯盒防污、易携、容量大，是游宴的理想用具⁴⁴。战国秦汉时期，耳杯盒内器物装饰风格一致，具有明显的系列化、组合化的设计倾向。战国、秦及汉初耳杯盒皆为厚重的木胎。西汉中期以后，耳杯盒胎骨变薄，为薄木胎、夹纻胎。楚耳杯盒体型较大，从早期狭长条形演变为长椭圆形，内存物品也非常丰富，除了耳杯，尚有壶、盒、盘等饮食器具。



图一二//长椭圆形耳杯盒

（安徽巢湖放王岗 M1：385；图片来源：《巢湖汉墓》，第68页，图四七：1）

秦出现的双耳长盒与椭圆形耳杯盒皆由楚并封形酒具盒简化而来，器形由长变短。目前，双耳长盒尚不能确认为一种耳杯盒。椭圆形耳杯盒器形较小，为存放整套耳杯的专用器具。

汉初，两湖地区流行椭圆形耳杯盒，皆以木胎控制而成，形制大体相同，长径与短径相近，内部物品也仅见耳杯一种器物。江淮地区的奩式耳杯盒呈现出与两湖地区迥异的风格，体现了在汉文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的差异性。奩式耳杯盒多为夹纻胎，内部存放的物品既有耳杯，亦有盘，整套器物的装饰风格一致。多子奩式耳杯盒比内嵌式双层分格耳杯盒出现略早，如同多子奩比

内嵌式双层分格奁出现得更早。多子奁式耳杯盒的子盒早期为椭圆形，晚期出现了四曲花瓣形。不同的子盒存放不同大小的耳杯，物品的摆放呈现出极强的秩序感，体现了西汉中期以后江淮地区髹漆业卓越的造型能力。东汉以后，瓷器对漆器的替代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传统漆器手工业暂时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期，漆耳杯盒、漆耳杯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1[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第 355 页。

2[2]陈建明、聂菲主编：《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 2019 年，第 36 页。

3[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木器》，《文物》2018 年第 11 期。

4[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第 3483-3484 页。

5[5]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第 359 页。

6[6]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第 143-149 页。

7[7]袁珂校译：《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192 页。

8[8]陈振裕主编：《中国漆器全集》第 2 卷，福建美术出版社 1997 年，“图版说明”，第 2 页。

9[9]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第 133 页。

10[10]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第 31 页。

11[1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编：《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第 28 页。

12[12]同[11]，第 34 页。

13[13]湖北省博物馆：《1978 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 年第 4 期。

14[14]荣经古墓发掘小组：《四川荣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4, 1981 年。

15[15]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 年第 4 期。

16[16]湖北省博物馆编：《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 1981 年。

17[17]同[2]，第 34 页。

18[18]同[2]，第 154-155 页。

19[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 年第 4 期。

-
- 20[20]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 21[21]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39页。
- 22[22]a. 扬州博物馆编：《汉广陵国漆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8页；b. 宝应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宝应县文化体育局编：《宝应馆藏文物精萃》，宝应县文史资料第十九辑，2007年，第60页。
- 23[23]江苏盱眙东阳 M208 资料为南京博物院陈刚研究馆员惠赠。
- 24[2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长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9期。
- 25[2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长三角圩墓地》，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5-66页。
- 26[26]同[25]，第130-131页。
- 27[27]傅举有主编：《中国漆器全集》第3卷，福建美术出版社1998年，“图版说明”，第73-74页。
- 28[28]刘芳芳：《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奁及相关问题研究》，《南方文物》2022年第1期。
- 29[29]同[3]。
- 30[3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 31[31]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天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1979年第4期。
- 32[32]盱眙县博物馆：《江苏东阳小云山一号汉墓》，《文物》2004年第5期。
- 33[33]南京博物院、仪征博物馆筹备办公室：《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 34[34]同[27]，“图版说明”，第66页。
- 35[35]同[27]，“图版说明”，第99页。
- 36[36]孙机：《关于汉代漆器的几个问题》，《文物》2004年第12期。
- 37[37]洪石：《西汉饮酒具研究——以漆器为中心（上）》，《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2期。
- 38[38]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 39[39]南波：《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3期。
- 40[40]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8期。

41[41]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编著：《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 1 号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20 年，第 491 页。

42[42]刘芳芳：《战国秦汉髹漆妆奁研究》，文物出版社 2021 年，第 229 页。

43[4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67 页。

44[44]展梦夏：《具杯盒与多子奁——汉代的便携、收纳利器》，《中国美术》2017 年第 4 期。